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 6 卷第 4 期 (总第 21 期)

主编: 闵维方: 副主编: 丁小浩 阎凤桥;

编辑:岳昌君 孙冰玉

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美差距何在?¹

杨钋2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研究所 北京,100871

摘要: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高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成本分担政策的推行,政府和社会对高校问责的要求日益提高。为了回应这些挑战,我国正逐步完善以教学评估、学科专业评估和大学排名为基础的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根据中美两国体系的差异,本文建议我国应该建立以政府和专业组织为主导的、使用多种质量保障工具的、分工明确的、具有中长期规划的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关键词:质量保障,问责制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Where is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U.S.?

Abstract: As a response to dramatic institution stratification,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 revenue source, and reinforcement of cost sharing policy, China has built an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characterizing with periodical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valuation, academic field evaluation and institution ranking. Using the U.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s a reference, it is argued the Chinese system (1) fails to integrat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to it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2) uses too few policy instruments to implement its accountability strategy; (3) has yet to professionalize its accreditation process; (4) and needs to introduce performance-based reporting and allocation to enhance its relevance, legitimacy and efficiency.

Keywords: Quality Assurance, Accountability

_

¹ 未发表论文,请勿引用。

² 联系方式: 杨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8 信箱,北京,100871, poyang@pku.edu.cn

中美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比较

一、关注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

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保障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新课题(丁琼,马涛,&邓鹏图,2006)。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新趋势引起了政府、社会和个人对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共同关注。

第一、高校扩招和重点院校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首先,高等教育部门的水平分化加剧。1997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部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地方性、非重点院校和民办院校的扩张来实现的(Wang, Wei, Yang, & Yi, 2008; 阎凤桥, 2008)。这些院校的迅猛发展稀释了它们原有的教育资源,降低了生均教育资源的拥有量和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国家加大了对"985"和"211"院校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了这些重点院校的资源和教育质量。这两个趋势加大了地方性院校和民办院校与重点院校之间的差距,即四年制高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差距进一步扩大(Gerber & Schaefer, 2004; 阎凤桥, 2008)。

同时,高等教育部门的扩张也导致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垂直分化,即三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分化(阎凤桥,卓晓辉,&余舰,2006)。高校扩招促进了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其规模已经占本科院校总量的半数(陈嵩,2007;陈嵩&郭扬,2006)。专科教育的大发展加速了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化,即三年制和四年制高等教育机构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这两种分化势必引起政府对地方性非重点院校、民办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质量的关注(阎凤桥,2008)。这种关注自然地转化为政府对高校的问责要求。

第二,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提高到了2006年的21%(阎凤桥 et al., 2006)。在此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也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扩招的速度远大于财政投入增长的速度,我国生均预算内高教投入从2002年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鲍威,2007)。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生均教育成本不断攀升(李文利,2008),因此财政投入供给和需求的缺口不断扩大。为了弥补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高校不断从其他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形成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鲍威,2007)。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出现必将提高社会对高教质量的期望,形成社会对高等院校进行问责的压力(Knight,2008)。

第三,成本分担政策的推行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了个人和家庭对高校质量的要求。 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成本分担政策的实施,导致家庭所负担的教育成本逐渐上升(李文利, 2008)。面对不断提高的高等教育价格和高等教育质量信息的缺失,学生和家长会要求高校 对自己的教育质量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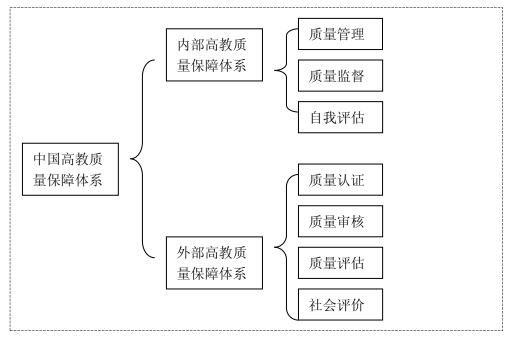
高等院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政府、社会与个人监督高等教育质量最直接的方式。换言之,建立高校外部质保体系—即引入高校认证和问责制—将满足社会各界监督教育质量的要求,促进高校稳定、健康发展(Burke, 2003)。本文将以中国和美国现有的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为蓝本,分析两国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设计、实施及其主要工具,为完善我国高教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提出可行的建议。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将探讨中美两国高教外部质保体系的构成和主要工具。第四部分将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高教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现状分析

为了满足十七大提出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我国的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地进行着发展和完善。目前,该体系分为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两部分(赵炬明,2008)。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高校自行建立的针对办学质量的保障体系,即生产质量监控体系,它是整个质保体系的基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指由社会对高校进行质量检查与评价的体系,即社会质量监控体系。

刘献君的研究对此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参见图 1)。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包括三部分,即质量管理、质量监控和自我评估。而外部保障体系较为复杂, 包括四个部分:质量认证、质量审核、质量评估和社会评价。在外部保障体系中,各部分的 负责机构不同,任务各异(刘献君,2008)。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肩 负着教育质量认证和问责制的功能,其主要工具是质量审核、质量评估和社会评价。

图 1、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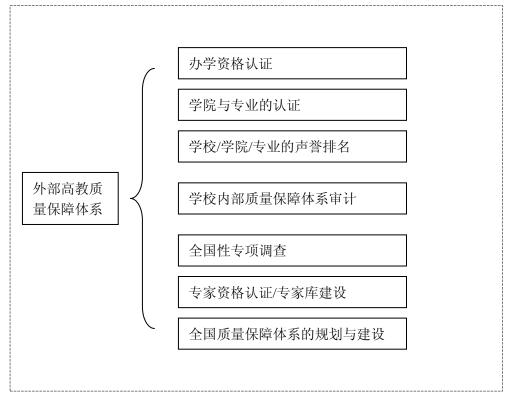


来源:转引自刘献君(2008)。

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监控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新趋势(赵炬明,2008)。高教外部质保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及其由它所带动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升。同时,高等教育也发展成为一个耗资巨大的产业部门,其质量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已经到来,高校发展从数量扩张逐步转向质量提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也使得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外部监督成为必然(赵炬明,2008)。

因此,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我国高教的外部质保体系加以细化和专业化。例如,赵炬明提出政府应该本着"多角度、多方法、多方参与"的原则来设计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图 2 总结了他提出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即办学资格认证;审查基本办学条件、学校目标;学院/专业的行业认证;学校/学院/专业的声誉排名;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审计;全国性专项调查;专家资格认证/专家库建设;全国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划与建设(赵炬明,2008)。简单分析表明,这个新模式强调了外部质保体系的认证和问责功能。此外,这个新模式提出了实施外部认证和问责的政策工具。例如,认证的工具包括办学资格认证、学院与专业认证、专家资格认证和专家库建设。问责制的工具则包括学校、学院、专业的声誉排名、学校内部质保体系审计、全国性专项调查和全国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划与建设。

图 2、中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设计



来源: 转引自赵炬明 (2008)。

在外部质保体系的实施方面,我国已经使用过专业质量评估、高校声誉排名和教学质量评估三种工具。这些项目承担了认证和问责的双重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了解和监督高教质量的要求,促进了高校和政府与社会的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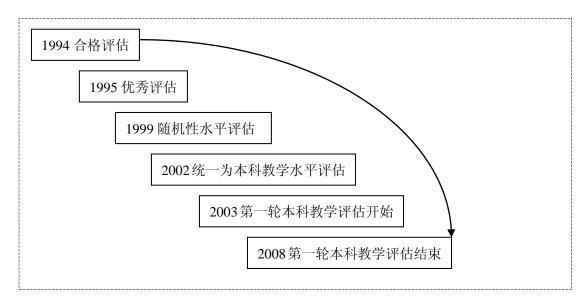
首先,专业质量评估已广泛开展。例如,教育部主持过多次学科专业质量评估,并且评选出一大批专业教育基地。截止 2005 年,教育部已经选出 51 个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98 个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13 个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和 58 个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 (朱洪涛, 2005)。这一系列的评估树立了高校发展的质量标准,使高校专业质量逐步走向透明化和公开化。

其次,在高校专业声誉排名方面,上海交通大学高教院从2002年开始,定期发布世界研究型院校的专业排名,用于指导高校的建设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刘念才,2008;刘念才,杨颉,吴燕,&程莹,2008)。交通排名已经成为业内评价高校质量的重要工具,在国内和国际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再次,教学评估成为我国办学资格认证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以来教育部主导的四次高教质量评估活动主要以教学评估为主(朱洪涛,2005)。图 3 总结了1994-2008年之间

的教育部组织的四次评估活动,其中包括 1994 年的合格评估、1995 年的优秀评估、1999 年的随机性水平评估、2003-2008 年的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从 2003 年开始,教育部将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化,准备建立五年一周期的水平评估制度(朱洪涛, 2005)。

图 3、中国高教教育评估发展过程(1994-2008)



来源: 转引自朱洪涛(2005)。

2003 年至 2008 年,教育部高教司和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指导教育部普通高校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和教学工作评估专家组,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本科教学评估(孙建荣, 2008)。 这次本科教学评估得到很多正面的反馈。研究者认为它推动了各校系统总结自己的发展历史,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定位和办学特色;确立了教学中心地位,营造了全校都来关心教学、 关心学生的良好局面和氛围,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刘献君, 2008)。

当然,目前存在若干国内尚未实施过的外部质量保障措施。例如,全国性专项调查在我国还未普及。全国高校中还没有实施过统一的新生调查、在校生学习情况调查,或者毕业生调查,以及学生满意度调查等。此外,我国的专业或者行业认证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孙建荣,2008;赵炬明,2008)。由于文献和数据的局限,目前很难对我国外部质保体系的设计、实施和效果进行系统的评估。

二、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

与中国高校质保体系相比,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备。根据

Knight (2008)和 Morse (2008)的研究,该体系同样分为两部分(参见图 4)。它的内部高 教质量保障体系包括教师活动分析、学生管理和学习评估三大部分。

美国外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包括以下八个部分。第一、联邦政府报告。美国公立高校通过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DS)向联邦政府报告各种内部信息,其中包括院校特征、学校教职工情况、招生情况、毕业生情况、毕业率、学校财务情况和学生资助情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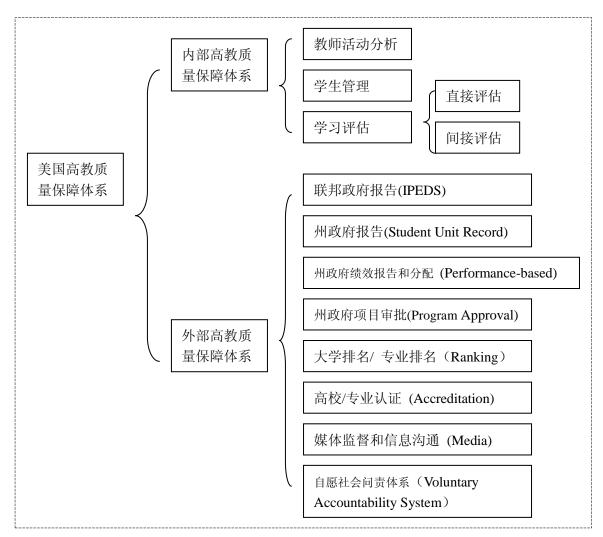
第二、州政府报告系统。美国各州政府通过各种形式收集学生个人信息,最为普遍的形式是学生个人信息系统(student unit-record system)和高等教育信息系统。通过高等教育信息系统,州政府可以收集高校课程和在校生注册信息、学校设施和课程安排信息、教师与教职工信息,以及高校财务信息。其中高校财务信息包括学校预算、教师工资、学校收入和支出等。

第三、州政府项目审批(program approval)。根据 Knight (2008)的介绍,美国各州 必须对所有公立学校新的学位项目进行审批,审批内容包括项目需求、期望的招生人数和招 生方案、成本和财务规划、其他学校提供此项目的情况、该项目对教师、设备、服务支持系 统的影响等。

第四、大学排名/专业排名(ranking)和指南。社会研究机构和媒体定期发布大学选择指南和排名,这些信息成为公众衡量和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工具。这些指南和排名关注的学校信息包括同行评估、新生标准化考试成绩、师资水平、毕业率和巩固率、财政资源、校友捐赠等。

第五、高校/专业认证(accreditation)。根据分析,美国高教认证的目的是为了向学生、家长和纳税人证明高校已经达到或保持了一定的质量水平,并为高校的改进提供建议。 美国教育认证是一个同行评议的过程,即由志愿院校代表组建各地认证机构,这些自发机构制定认证指导方针,并根据这些方针定期检查高校质量。

图 4、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来源: 作者根据 Knight (2008) 和 Morse (2008) 整理。

第六、州政府绩效报告和分配(performance-based reporting and allocation)。美国过半数的州使用绩效报告、绩效预算或者绩效拨款来监督高校质量(杨钋,2008)。绩效分配将高校表现和质量与预算直接联系起来,使用资金来直接激励高校改善教学和管理。周期性的绩效报告综述了美国各州和州内每个高等教育机构在公立高等教育首要绩效指标上的表现,这些指标和绩效预算与拨款的指标类似。虽然绩效报告和预算过程只有间接的联系,但是它被认为对高等院校的表现有直接的影响(Burke,2003)。

第七、媒体监督和信息沟通是高教外部质保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要不断回应媒体代表公众对高校质量提出的质询,其中包括对它们学生、教师和财务等多方面情况的询问。通过这些沟通,公众有机会了解高校内部的运行机制和效率。和大学排名类似,媒体等社会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八、自愿社会问责体系(voluntary accountability system)。最近,美国州立高等教育协会和赠地学院协会组织美国高校成立了自愿社会问责体系,向公众提供高校问责信息。和政府主导的绩效报告和分配等问责方式不同,自愿社会问责体系的主导者是高校和社会性组织,它们联合起来回应社会对高校的问责要求。

上述八个部分相互补充,构成了较为完善的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美国的外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美国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利用了高校和社会专业组织的力量(Burke, 2004b; Morse, 2008)。例如,为了反对拟议中的联邦政府强加的高校问责制,各高校在州立高校协会和全国州立与赠地学院协会的组织下,建立了自愿社会问责体系(voluntary accountability system)来满足公众问责的要求(Knight, 2008; Morse, 2008)。

和传统的由州政府主导的问责体系相比,自愿社会问责体系的目的有所不同。州政府主导的绩效报告和分配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问责的要求和提高高校内部运行效率(Burke, 2003)。自愿社会问责体系的目标包括(1)向公众说明高校问责情况;(2)通过衡量教育成果来确定富有效率的教育实践;(3)整合易于得到、易于理解和可比较的高校信息(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2008)。

从评价指标来看,自愿社会问责体系比州政府主导的问责体系更注重学生的满意度和学习效果。这种重视来源于高校对内部教育质量的关心和专业组织的要求。表一总结了两种问责体系的主要指标。

自愿社会问责体系的指标包括学生特征、成本与财政资助情况、学位授予情况、院校特征、学生参与和满意度、学生学习评估结果等。在"学生参与和满意度"和"学生学习评估结果"中,自愿社会问责体系广泛使用了各种专业性组织设计的问卷和调查工具,例如全国学生参与情况调查,大学生经验调查、大学毕业生调查、大学生学术熟练程度评估、大学生学习评价等。

表一、州政府绩效指标和自愿社会问责指标

州政府绩效指标		自愿社会问责指标	
1	政府拨款	1	学生特征
2	学杂费可负担性	2	教育成本和学生资助
3	高等教育参与	3	新生和转校生的申请和录取人数
4	两到四年制大学转学率	4	院校的学位和研究领域
5	大学完成率	5	院校特征
6	学位完成率		班级规模、生师比
	关键领域学位完成率		教师特征
7	毕业生就业率		学生宿舍条件、校园治安
8	中学 / 大学协调		院校分类
9	外部资助科研	6	学生经验与参与结果
10	学生发展	7	学生学习评估

来源: 作者整理 Yang (2008)和 VSA (2008)归纳。

此外,高校认证是另一种以专业组织为主导的高校外部质量保障工具。美国高校的认证工作主要由六个地区性认证机构担任(中北部高教认证协会、中部高教认证协会、新英格兰高教认证协会、西北部高教认证协会、南部高教认证协会、西部高教认证协会),而不是联邦或者州政府部门。这些认证机构由来自各高校的志愿专业人士组成,其中包括院校研究人员、高校领导和学科专家,但不包括政府机构人员。自愿社会问责和认证这两种由社会组织联合高校进行信息公开和发布的形式,是美国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显著特征(Knight, 2008)。

第二、在高教外部监督机制中,美国引入了多种工具,受到了高校、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鼓励。美国外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的八个部分,使用了多种问责工具,例如认证、信息披露和报告、专项调查、绩效分配和报告。

首次,在外部监督机制中,对高校学院、专业和学校的认证通过非政府的专业认证机构来进行,而不是简单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评估。由于认证的范围比教学评估更为全面,有利于对高校质量的全面监督(Morse, 2008)。此外,认证比评估更加尊重学校的使命和办学目标。同时,认证以促进学校的改进和提高为目标,而不是学校的比较和排名。

其次,政府通过控制高校的信息和信息披露来掌握院校的质量,并进行有效的监督 (Knight, 2008)。联邦政府通过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 收集院校情况。通过这些信息的披露,联邦政府对所有接受联邦政府奖助贷学金的学校进行了间接的控制。与此类似,州政府普遍建立了学生个人信息系统,收集在本州就读大中小学的学生情况。根据学生的学业情况

和资助情况,州政府也可以间接地了解高校的质量。披露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对高校质量最为直接的监督和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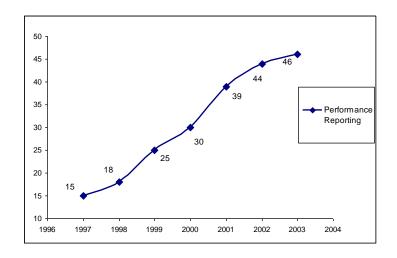
另一项广为实施的质量保障措施就是实施各种全国性专项调查,例如全国学生参与情况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大学新生调查(First-year Experience Survey)、毕业生调查(Senior Student Survey)等(McCormick, 2008)。专项调查的优势在于集中收集高校质量某一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难以通过教学评估获得的学生学习参与和进步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为高校发展提供直接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与教学评估相比,常规的专项调查能够更为深入地提供有关院校教学效果和满意度的信息,而不是教学投入和过程信息,更加符合高校问责制的要求。

最后,除了认证、信息披露、专项调查,绩效报告和绩效分配也是美国各州经常使用的 外部质量保障手段。与教学评估相比,绩效报告和绩效分配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显著。

第三、美国经验表明将短期的专项调查和中长期的专业认证和学校认证结合起来,可以事半功倍,取得很好的效果(Burke,2004a;McCormick,2008)。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定期更换,这些负责人倾向于使用短期的专项调查与绩效报告来控制高校质量,这势必诱发高校的短期性寻租行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外部质保体系中纳入了中长期高校认证。这些认证过程一般以十年为周期进行,有利于社会对高校进行长时段的监督和院校的中长期规划。

第四、建立程序性的问责体系。尽管最近几年来高校自愿社会问责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美国各州外部质保体系的主导者仍然是绩效报告。从 1997 年到 2003 年,使用绩效报告来监督公立高校表现的州从 15 个增加到 46 个(参见图 5)。这说明了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监督的主要模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以绩效报告为主的评价体系(Yang, 2008)。将绩效评估制度化、程序化,可以降低高校对外部问责制的抵制,降低绩效评估的成本,提高政府问责的效率。

图 5、美国各州使用绩效报告的情况(1997-2003)



来源:根据作者对Burke (1999, 2000, 2002, 2003)的总结。

三、 对发展我国外部高教质保体系的建议

第一、提倡以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主导的外部质量监督,也要重视高校的作用。很明显, 我国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其直属机构负责。例如学科专业质量评估和本 科教学评估都由教育部高教司主持,而不是学科专业学会等社会组织。部分专业评估机构也 是政府的附属部门,例如附属于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此外,在外部监控体系中,高 校是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

对美国经验的分析表明,专业组织可以使用多种方式监督高校质量,成为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公立院校不仅是被监督者,也是质量保障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外部高教质保体系的多元化参与,有利于保证质量监督过程的公正、客观和效率。由政府主导的评估、认证或者排名工作,容易诱发高校的寻租和游说行为,导致质量监督成本的上升,并且影响评估结果的公正性。中立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的参与,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利用专家的经验和能力,以最小的成本完成专业的评估和认证工作。多元参与有利于各方面(学校、政府、社会)力量的制衡和牵制。因此,我国应考虑在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引入社会和高校的力量。

第二、提倡教学评估,但也要重视认证、信息披露、专项调查、财政分配等其他工具。 对我国已经使用的各种外部质量保障工具的分析表明,政府显然偏好使用评估作为其首要的 政策工具。我国的五次评估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受到不少批评(孙建荣, 2008; 赵炬明, 2008)。例如,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不同类型的学校,如重点央属院校、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只用一套标准来衡量具有不同使命和办学目标的多种类型学校,容易扭曲这些学校的行为。此外,评估专家的权威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由于存在跨专业评估和跨领域评估的现象,某些专家面临较大的认知距离,缺乏客观评估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些政府主导的评估不利于社会的介入、参与和监督(赵炬明, 2008)。

相比之下,美国的外部质保体系中使用了认证、信息披露、专项调查和以绩效为基础的报告和分配等多种政策工具。多元质量保障工具的使用有利于创造多元激励机制,鼓励高校进行创新,提高评估的内部和外部效度,降低质量监督成本。多元工具的存在形成了互补的激励机制,鼓励高校通过各种途径使内部与外部质量监督机制接轨。此外,信息披露、专项调查和绩效报告等质量保障方式的成本较低,且由政府、行业组织和高校共同分担,有利于鼓励高校的合作与参与。因此,我国在完善外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应用多种保障工具。

第三、提倡细化分工,提出可实施的项目设计和中长期规划。如前所述,我国的高教外部质保体系还比较松散,主要依赖于教学评估、专业排名和学科专业质量评估。赵炬明提出的新模式对我国的现有模式进行了补充和提高,值得借鉴(赵炬明,2008)。

针对我国现行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本文认为应该将教学评估所担负的多种功能剥离开来,赋予每一种质量保障功能以相应的保障工具。例如,教学评估不应兼备质量认证和质量评估的功能,应该将质量认证的功能交给办学资格认证或者专业学院与专业认证来完成。此外,还应该加强质量保障体系的专业化建设和社会参与(赵炬明,2008),从而保证外部质保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引入中长期的专业认证和学校认证将鼓励学校和社会着眼于学校的长期发展,为建立长期的高校质量保障机制提供基础。我国高教外部保障机制的发展应该向全面和细化分工的方向发展,同时鼓励中长期规划和社会力量的介入。

第四、明确地提出高校问责制,建立高教内部和外部保障体制之间的沟通机制。目前,对我国高教质量保障体系的讨论与高校问责制的讨论相分离。尽管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高校问责机制的必要性和困难(朱生营,2006;吴景松 & 程宜康,2007),他们尚未将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现有的高教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联系起来研究。研究者倾向于鼓励政府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独立的问责机制,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比较经验都存在一定差距。

在实践中,我国高校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肩负着教育质量认证和问责制的功能。因

此,高校问责制实际上是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的主要渠道之一,即高校向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或个人通过汇报、解释、证明及回答高校的资源使用情况及效果(高耀丽,2005;吴景松&程宜康,2007)。明确提出建立高校问责制,既有利于专业组织参与外部质保体系的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又服务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最后,目前对我国高教质量保障体系的讨论,尚未提出将高教内部和外部保障机制联系起来的沟通机制。以美国的经验来看,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工具应该是绩效评价体系(杨钋,2008)。综上所述,我国未来的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应该是以政府和专业组织为主导的、使用多种质量保障工具的、分工明确的、具有中长期规划的体系,其核心是建立切实可行的高校问责制。

参考文献

- Burke, J. C. (2003). The new accountability for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rom regulation to results. *Research in University Evaluation*, 3(Sep), 65-87.
- Burke, J. C. (2004a). 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balancing public, 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 (1 ed.). CA: Jossey-Bass.
- Burke, J. C. (2004b). Reinventing accountability: From bureaucratic rules to performance results. In J. C. Burke (Ed.), *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Balancing Public, 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 (pp. 216-245). CA: Jossey-Bass.
- Gerber, T. P., & Schaefer, D. R. (2004).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ussia: Trends, gender differences, adn labor market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1), 32-59.
- Knight, W. E. (2008). *Quality assurance and its support by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 McCormick, A. C. (2008). Assessing and improv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 Morse, J. (2008). Accredit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U.S. regional accrediting agen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 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2008). The 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VSA). Retrieved Aug 26, 2008, from http://www.voluntarysystem.org/index.cfm?page=homePage
- Wang, R., Wei, J., Yang, P., & Yi, Q. (2008).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challen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Bangkok, Thailand
- Yang, P. (2008). *Performance-based Allocation in Tertiary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 9). Beijing, China: Chines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Finance Researcho. Document Number)
- 丁琼,马涛,&邓鹏图. (2006). 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发展研究. *高教发展与评估,,22*(1),28-31.

朱生营. (2006). 当前我国高校问责制的不足与改进. 煤炭高等教育, 24(6), 11-13.

朱洪涛. (2005).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情况介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评估处

李文利. (2008).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 In 李文利 (Ed.), 高等教育 经费需求与供给研究(pp. 100-123). 北京,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

高耀丽. (2005). 英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及其启示. 高等教育研究, 26(11), 103-107.

刘念才. (2008). *大学排名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刘念才、杨颉、吴燕、& 程莹、(2008)、院系中长期评估: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的路径.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 州.

刘献君. (2008). 加强院校研究,改革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吴景松, & 程宜康. (2007). 我国高校问责制之现实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江苏 *高教, 2007*(1), 44-46.

孙建荣. (2008). 中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比较研究.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杨钋. (2008). 以绩效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比较的视角. *教育发展* 研究, 07.

赵炬明. (2008). 超越评估一关于建设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年会,广州.

阎凤桥. (2008).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的系统特征分析. 北大教育经济研 *究, 6*(1), 15.

阎凤桥, 卓晓辉, & 余舰, (2006),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普通高等教育 系统的变化分析.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4*(3), 13.

陈嵩. (2007). 我国不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 职业技术研 究, 28(7), 5-10.

陈嵩, & 郭扬. (2006). 我国高职教育十年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教育发展研究, *2006*(19), 18-21.

鲍威. (2007). 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资金筹措机制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2007(7-8A), 63-68.